



长篇报告文学

高危时刻

王锦秋 洪建国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篇报告文学

高危时刻

GAOWEI SHIKE

王锦秋 洪建国◎著

時代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危时刻 / 王锦秋, 洪建国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387-5455-1

I. ①高… II. ①王… ②洪…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01968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邓淑杰

选题策划 方伟

责任编辑 方伟 杨迪

装帧设计 孙利

排版制作 张月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违者必究



高危时刻

王锦秋 洪建国 著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

印刷 /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710mm × 1000mm 1 / 16 字数 / 160千字 印张 / 12.5

版次 / 2017年6月第1版 印次 /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38.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大国担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塞医疗队抗击埃博拉疫情纪实》自2016年4月出版后，即被选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获得中国图书评论学会颁发的“2016中国好书”。

为了突出其文学性及细节感，提升其更为纯粹的“纪实性”品质，作者在原文稿的基础上，对叙述方式、内容及结构进行更加客观的调整；同时，在创作《大国担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塞医疗队抗击埃博拉疫情纪实》时，作者积存了大量未曾使用的原始材料，在创作本书时，除了对材料再次进行细致甄选，补充某些遗漏的珍贵资料外，还对行动的参与者进行了深度的采访，查阅了大量的相关医学及背景材料，对现场所发生的事件又做了逐一核实，使整个文本的品质有了进一步的提升，“更加靠近事实”，终于完成了新文本——《高危时刻》。

本书主要采取口述实录的方式，其个体性的特征更为明显，细节性和现场感更为突出，更加真实地还原了这次震憾世界的突发瘟疫，以及中国防疫医务人员在参与国际救援行动中令人肃然起敬的表现。

前　　言

“那两个多月发生了很多事，事后想起来感觉就像梦一样，只有个模糊的印象，某些惊险的片段还能偶尔想起来。但即使是当时感到很震撼的场景，现在看起来也有不过如此的感觉。一起同去的战友聚会时会谈起那段往事，他们谈到某个细节时，我有时会惊讶地问‘是吗？我给忘了’，我甚至不太相信‘历历在目’的说法，记忆总是不断地退化。”

关于援塞队员怎么看待那段日子，上边这段话很有代表性。

也有人说：“怎么会忘记呢？有时候做梦都会回到那个现场。”

面对不同的受访者，你会发现，要还原最真实的情景非常困难，口述虽然是最直接的解决办法，但事实是，记忆多多少少都是有缺陷的，每个人的关注点也不一样，口述材料使用起来要相当慎重，并且当事人已经过了最佳的记忆期，细节会有所遗漏或不准确；还有不少人不愿意再去回忆，部分是因为当下大量新鲜的工作和生活内容充斥着大脑，淹没了以往的记忆，还有一些人是想要忘记那段“残酷”的经历。

即使这样，我们还是采用了“挤牙膏”式的采访方式，力图在共同回忆的基础上建构起真实的文本。本书由以下几部分内容构建而成：来自不同亲历者的讲述，彼此相互印证；他们在极端繁重和危险的工作之外积累下来的文字材料、图片和新闻稿件；一些日记和工作总结；当然，大量的背景材料的收集也是必不可少的。

援塞医疗队在塞拉利昂这 185 天发生了什么，也许用下面这一段简短的汇报材料就可以概括出来：

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塞医疗队在半年时间内独立担当重灾区塞拉利昂的防治任务。医疗队3个批次114名官兵，通过185天的接力奋战，共收治埃博拉疑似患者773例，确诊285例，埃博拉患者治愈率51.23%；在20多个国家救援队伍中，创造了全体队员无一例感染的救援纪录；培训塞方工作人员500余人次；配制药品套餐1200余份，调剂药品124批次，发放各类耗材69780件，配制消毒液35.7吨。

我们不想队员们那段鲜为人知的经历，被这样几个数字就简简单单地打发过去，任其轻易湮没。过去总是太容易忘记了，我们努力用真实的文字尽可能多地记录下一些片段，我们要用所有参与者交错的记忆告诉读者：有人在你不知道的地方拯救生命，那个地方叫塞拉利昂；他们不应该被忘记，他们中有人为了国家使命几乎献出了生命，却从不在意是不是有人会记得他们。他们所做的，正如《希波克拉底誓言》所言：无论到了什么地方，也无论需诊治的病人是男是女、是自由民是奴婢，对他们我一视同仁，为他们谋幸福是我唯一的目的。

2017年1月1日

目 录

序幕	001
第一批援塞医疗队 (2014年9月16日—2014年11月16日)	031
第二批援塞医疗队 (2014年11月7日—2015年1月21日)	079
第三批援塞医疗队 (2015年1月14日—2015年3月21日)	125
重返塞拉利昂	175
附录： 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塞医疗队人员名单	187

序　　幕

接 触

这次疫情暴发于几内亚。

2013年12月，在几内亚与利比里亚交界地带，有55个人莫名其妙地死去。非洲的传染病比较多，当时还以为这些人是死于拉沙热，没有人会想到是埃博拉，因为埃博拉还从没有在西非流行过。2014年，两个利比里亚妇女去几内亚参加了一个葬礼，回来之后两人便开始发烧，而且很快死去。利比里亚有一位在中非工作过的官员，觉得这两个妇女的症状很像被埃博拉病毒感染了，他建议把标本送去检测。由于这样的检测在非洲无法实现，于是送到了法国巴斯德研究所，果然检测出了埃博拉病毒。紧接着3月，疫情在利比里亚暴发，随后传到了塞拉利昂。

经塞拉利昂卫生部确认，国内首个病例是一名因高热和流产到凯内马医院就诊的年轻女性，她由于参加了几内亚一名死于埃博拉的医生的葬礼而感染上病毒，葬礼上还有其他13名妇女，正是她们将病毒从几内亚带到了塞拉利昂。那位几内亚东部边境小村的医生，自称有治疗埃博拉的非凡能力，却最终命丧埃博拉。在那个医生的葬礼上，前来的悼念者也被感染，随之引发了一连串感染、死亡、葬礼和更多感染的连锁反应。

2014年3月17日，中国援助几内亚医疗队的队员，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的中几友好医院外接诊一名当地的男性患者，这位病人的病症表现为发热、呕血、瞳孔异常和腹痛，CT检查为颅内出血。虽经积极救治，但患者高烧不止，左眼的白眼球消失，变成恐怖的红色，随即因抢救无效死亡，后来其被证实为科纳克里的第一例埃博拉患者。

中国援助几内亚医疗队的队员曹广一直用微博记录着援非的生活，他是来自北京市安贞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3月25日，他写道：“这次

埃博拉病毒流行已经造成 59 人死亡。我们病房目前也是比较危险的地方……所有腹痛发热出血患者，都会收到我们病房……”^①

医院内与病人有过接触的 6 名医生护士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他也成为接触埃博拉患者的第一位中国医生。3 月 26 日，他和另外一名中国医生同时进行隔离观察。

即使面临着死亡的危险，他仍然不间断地在微博上发布着事情的进展：

今天我决定向大家汇报一个非常悲痛的消息，和我一起工作的医生 Dr Gassimou，还有我们科一名护士 Madamu Camara，因为在工作中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导致死亡。我也因为曾经接触过患者，以及同 Gassimou 一起手术过，而接受隔离观察。今天是我接触患者后第 18 天，和 Gassimou 最后一次手术接触后第 11 天。

这是我当医生以来第一次看见同事牺牲，他们的死让我感触很多。在非洲工作，会有这种生命危险，作为一名医疗队员，我真正能体会到前辈们援非的艰辛。由于我是当事者，心理上的压力更是巨大。病毒带走了我的两名同事，还有一名在留观期间，我真的能幸免吗？希望自己命大吧。

埃博拉感染后发病到死亡时间较短，这看起来虽然残酷，但对于其他个体来说，也并不是坏事。我所接触的那名患者临终前的表现，确实令人胆寒，见一次便会记忆终身。

4 月 14 日，隔离观察期结束，他与死神擦身而过，终于可以松了一口气了：

^① 引自曹广个人微博，下同。

……终于不用再麻烦队友们给我打饭了。我们目前的状态其实还是很稳定的。每日三餐、锻炼、门诊照旧，只是减少和当地人接触，即便是上街也尽量避免过多接触。买生活必需品大多依靠当地人来送。队员的精神状态也还不错，只是希望疫情能进入平台期，让大家歇口气吧。现在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航班能否正常运行，以及回家以后是否需要强制隔离。

在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市，中塞友好医院的中国援非医疗队的医生们处于同样危险的境地。埃博拉疫情5月份在塞拉利昂开始变得严重，但仍有20多名中方医务人员和30多名当地员工坚持工作。他们保持高度警惕，加强了防护措施，佩戴上口罩和手套，穿上了隔离衣。

7月31日凌晨2时，医院接诊一名特殊的患者，中国医生是在有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对其进行了常规检查。8月1日晚7时，患者出现了昏迷，立即安排抢救，不久塞拉利昂卫生部的专家就来到医院。这名病人原来是当地防疫中心的一名护士，几天前就开始发烧，防疫中心怀疑她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于是对她进行抽血送检，在等待检测结果的时候，病人自知情况不妙，于是私自跑到医疗条件较好的中塞友好医院求医。这名护士在被确诊感染埃博拉病毒4个小时后，不治身亡。

中塞友好医院随即关闭。亲临现场的新华社记者在8月16日的报道中写道，中塞友好医院门诊大厅的分诊台上，一本患者资料登记簿记下了关闭的日期：8月1日。到处弥漫着消毒后氯水的气味，一些医疗垃圾还未做处理。就是在那天晚上，与病人接触过的7名中方、10名塞方医务人员全部就地隔离观察。十分幸运的是，他们未出现被埃博拉感染的症状。

医院的大门紧闭，由全副武装且佩戴口罩的军警把守，往来人员必须查明身份，并经过重重确认才放行。曾接治过埃博拉确诊病患的门诊楼已经关闭，住院楼的病人也全部撤出，整座医院显得异常空荡。发现确诊病例后，塞卫生部和医院对整个院区进行了两次彻底消毒。

在门卫室里，军警和医院保安戴着手套并排而坐，他们面前摆放着一桶含氯消毒水。塞方的 10 名人员被隔离在医技楼，医技楼后面是被隔离的中方医务人员所在的住院楼，被隔离的医务人员住在 2 层，医院安排了专人每天送饭。他们也不是与世隔绝的，这里有互联网接入，与外界联系畅通，剩下的时间就是等待。除了被隔离人员外，其他中方医护人员待在一座专家楼里。此前，在首都弗里敦市金哈曼路医院工作的一名中国医生也曾因为接诊埃博拉确诊病人而接受隔离，但已经排除了感染的可能。

在利比里亚首都医院，中国援利比里亚医疗队仍坚持接诊。利比里亚外交学院院长科内表示：“在我们急需外界帮助的关键时刻，中方多次提供的援助将有力帮助利比里亚抗击疫情蔓延。”^①

几内亚国际合作部亚洲司官员凯塔接受采访时说：“埃博拉疫情暴发后，中国是第一个向几内亚提供帮助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已向几内亚提供了 4 批援助物资。中国提供的援助令所有几内亚人感动。”^②

8 月上旬，中国疾控中心派出了 9 名公共卫生专家分 3 组前往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 3 国支援抗击埃博拉疫情，对当地的防疫工作人员进行疫情防控培训。此外，中国还援助了物资，包括 3000 套防护服。

很少有人知道，自从新中国成立后，已经有近 23000 名中国医务人员来到非洲，一个省对应支援一个国家，每个省都会派出专门负责医疗援助的援非医疗队，长年驻扎在那里。湖南省对应支援的是塞拉利昂，曾经向塞拉利昂派出了 16 批医疗队，总人数达 210 人，接诊病人 200 多万人次，开展手术 20 多万例。

9 月 10 日，来自《人民日报》记者的现场报道中显示，由于疫情的影响，经营塞拉利昂航线的 9 家航空公司中有 5 家已经暂停航班，记者是从南非用了近 20 小时才来到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他采访了在金哈曼路医院

① 《人民日报》2015 年 5 月 31 日 3 版。

② 同上。

刚刚结束 21 天隔离观察的中国医疗队医生王煜，王煜告诉他说：“刚开始几天，我有些坐卧不宁，白天想睡又睡不着，晚上会失眠，辗转反侧，生活没有规律，心中感到失落、孤独，还有恐惧。以前的埃博拉是抽象的，没有想到会一下子落在自己头上。塞拉利昂在内战后刚有些好转，这一下埃博拉又把所有人都吓跑了，不知道还会持续多久。”

记者走在路上，很多人还会大声地向他打招呼，一旦他戴着手套和口罩出门，周围的人就会用怪异的眼光看着他，一些孩子还上前好奇地打量着被汗水湿透的手套。在药店里的一次性手套一副 2000 利昂（约合 0.44 美元），免洗消毒液 13000 利昂（约合 2.89 美元）。也就是说，一副一次性手套足够买两块面包，这些防护药品被大部分当地人当成了奢侈品，因为病毒抵不过饥饿。许多西方人远离塞拉利昂的时候，中国医生、中国企业选择坚守阵地。

肯尼亚航空宣布自 9 月 20 日起暂停飞塞拉利昂的航班，而实际上，18 日和 19 日的航班都被取消了。法航虽然官方未宣布取消飞塞拉利昂的航班，但法航机组人员表示拒绝飞往塞拉利昂。以前还有从弗里敦开到几内亚科纳克里的船，那时候船也没有了。仅剩下飞往摩洛哥和布鲁塞尔的飞机，机票几乎抢购一空，而且购买机票的人也在担心自己的航班是会被保留还是在最后一分钟被取消。^①

据联合国的官方通报，西非的这次埃博拉疫情，是这种病毒近 40 年中最严重、规模最大和情况最复杂的一次暴发。研究证实，疫情的蔓延主要是人际间的传播。因此，隔离患者是接下来的重点工作。埃博拉病症初期的防治需要对本地科学家和医生进行更多培训。如果国内的病情可以准确快速地确定，那么疫情将会减弱。没有人能预测出此次疫情将持续至何时，疫情完全得到控制也许仍需要数月的时间——只能依靠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和援助。

^① 《人民日报》2014年8月22日9版。

命 令

自从 2014 年埃博拉疫情发生后，三〇二医院就时刻关注着疫情的动向和病毒的研究，陈菊梅、姜素椿、王福生、赵景民、赵敏、秦恩强等传染病专家，接连撰写数十篇埃博拉防控科普文章，其中《三〇二医院传染病专家建言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被送进了中南海。8 月 10 日，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张高丽副总理就埃博拉疫情防控问题分别做出重要批示。

9 月 1 日到 8 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专门派出专家考察组奔赴塞拉利昂考察疫情。在这个组里，三〇二医院副院长兼医务部主任李进是最后一个被通知加入考察组的，上了飞机他才知道专家们大都是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选派的疾控专家，考察的主要任务是为在塞拉利昂开展实验室检测选址。考察前，国家一直没有确定是否要向塞拉利昂派遣医疗队，让李进参加考察是为医疗队选址，这是国家出于有备无患的考虑，一旦要组建医疗队，到了塞拉利昂能立即找到开展诊疗的地方。但直到考察结束，国家也没有确定是否要向塞拉利昂派遣医疗队。

9 月 11 日，从塞拉利昂回国的考察组集体向国家卫计委做汇报。随着西非埃博拉疫情的迅速蔓延，出现了难以控制的局面。9 月 12 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电话会议上指出，目前正在肆虐的这场近 40 年来波及地区最广、疫情最复杂、病况最严重的西非埃博拉疫情，急需国际社会伸出援手，有力量的国家要有所动作，紧急应对此次疫情。为此她发出了呼吁：“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人力。合适的人员、合适的医疗专家、受过适当培训而了解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感

染的专家。”

在李进向国家卫计委做完汇报后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12日的15点30分，抽组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塞医疗队的命令就到了三〇二医院。

命令一到，在短短的2小时之内，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批援塞医疗队30名队员就抽调完毕。在这30名队员中，医护人员分别来自感染性疾病科、重症医学科、感染管理科、临床检验科和感染护理科等学科专业，其中有5名博士、6名硕士，5个科室主任、副主任。他们大都是全军唯一的野战传染病医疗所队员，每年都会参加大型的备战拉练和演练，2014年3月，他们参加了首都联合防空演习；7月，刚刚完成了总部对野战医疗所的野战拉动能力考核验收。有的队员还参加过抗震救灾、抗击“非典”、防控“甲流”、亚丁湾护航等多样化任务。他们不仅是三〇二医院的顶梁柱，也是国家和军队的宝贵专业人才。

命令下达的72小时之内，医疗队完成了方案的制订和人员的防护培训，这一切都来自他们多年积累的经验和专业素养。

第一批援塞医疗队教导员孙捷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8月份，在我们出发前的两三个星期，事情还没有定下来，说只派遣国家检测队去。没想到9月12日命令就下来了，而且16日就要集结出发，时间相当紧迫，出乎我们的预料。

埃博拉感染者需要专业医疗机构通过检测筛查出来，当地现有的医疗条件无法做到，这个时候就需要外来援助。最早的两个检测中心分别是我们国家和南非建立的，后来英国疾病控制中心也参与了检测。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向中国国家领导人呼吁，希望中国能够参与到国际公共卫生重大事件中，派遣检测队参与救治行动。所以国家检测队比我们准备得早。虽然我们医院没有定下来，但也让我们做好准备。

国家检测队是国家疾病控制中心派过去的，在当地建立了一个检测中心，带去的是P3的流动检测车，执行筛查和检测的任务。但是只是建立一个实验室是不够的，收集标本还要靠我们医疗队。有标本才能进行检测，通过检测的准确率和出报告的时间，才能够让别人知道中国能做得并不比别人差。

这次我们远赴万里之遥，坐飞机要20多个小时，空运物资得包一架大飞机，人员专机送往。要调动军队的医疗队到塞拉利昂，背后是国家22个部委协调运作，也就是国家的联防联控体系，才能做得到的。比如要用飞机把人从北京运到非洲去，需要航空公司规划国际航线，要得到十几国的飞越许可；再比如在当地修建中心，用水、发电、储油，没有22个部委的支持，如何能做到。由此就可以知道我们在执行一项多么重大的任务。除了人道主义救援，我们还帮助当地建立了一整套传染病院的管理体系，并且对当地的人员进行了培训，参与他们国家的建设。在这一过程当中，我们的队伍也得到了锻炼，比如国家的联防联控机制、远程海外的协调机制，还有我们人员能力的培养，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拓展国际视野。